

孔孟之道的源头是周公之道

孟子最早提出“周孔之道”，《孟子·滕文公上》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华夏已经有两千多年的礼乐文明积累，四周夷狄却没有礼乐，处于野蛮状态。夷夏之辨正在于礼乐文明。“用夏变夷”就是以先进的礼乐文明影响中原地区以外的僻远部族。楚国当时属于夷狄，陈良是楚国人，他到北方来学习周孔之道，成为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

司马迁对周公不但有一种深厚的景仰之情，而且把周公作为“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来学习仿效。在《太史公自序》中，他激动地回忆了父亲临终时的嘱托：“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他将孔子列入“世家”，在《史记》中不惜笔墨描述孔子恢复周礼、折中六艺的功绩，以其如椽巨笔，对周孔之道、六艺之统及礼乐思想的传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淮南子·要略》篇亦云：“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可见，“孔子传周公之道”是先秦、秦汉时期人的共识。

隋唐之际的大儒王通特别推崇“周孔之道”，《中说·王道篇》云：“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周孔之道则是神圣之道。王通以为，孔子之后，周孔之道无人发扬光大，而他则肩负着传承周孔之道的神圣使命。

唐太宗即位以后，急需探讨国家长治久安之策，周孔之道无疑是最符合统治需求的大道。他要用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以礼乐具体措施来治理国家，于是太宗一朝君臣共同努力，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发展很快，百姓丰衣足食，社会秩序安定，出现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大同之世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其治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无愧为古今治理之道的辉煌乐章。

中唐韩愈提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认为周孔之道上承圣王，下启后儒，周公兼有事功与言论之长，但更倾向于君王一系的“治统”，而孔子开出“道统”，传到孟子却断了。这个道统在韩愈看来，主要是“仁”“义”之道

宋朝皇帝的人文修养

□ 陈良



赵佶《文会图》(局部)

陈亮遇到了宋孝宗

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正月，布衣陈亮直接上书，谈论恢复中原对策。孝宗皇帝看了书奏，大为震动，要把它张贴于朝堂之上以激励群臣，并召见陈亮，拟予以破格重用。但是，这一篇奏议，却招致妥协派大臣的忌恨，“尤恶其直言无讳”。由于他们诋毁阻挠，起用陈亮之事终究泡汤。陈亮十分失望，快快回归故乡，不时借酒浇愁。一次，他与某狂士携带一位乐妓到萧寺饮酒。酒喝多了，狂士便称乐妓为妃子。旁边有一位酒客随即揶揄狂士：你既然封了妃子，那么谁为宰相？狂士用手比画说：陈亮为左相，你为右相。用你俩做两个宰相，大事可成矣。于是，酒客让狂士端坐大殿中央，他与陈亮一

右一左上前奏拜；乐妓捧着酒杯，唱起了《降黄龙》。歌毕，三人齐声欢呼“万岁”。

狂士过了一把“皇帝”瘾，陈亮过了一把“宰相”瘾。

殊不知，那个酒客别有用心，故意给陈亮挖坑。“封妃拜相”结束，那个酒客随即跳过县州衙门，直接进京城（临安）到刑部投诉，指控陈亮图谋不轨。陈亮曾参加科举考试，因考官何澹不喜欢他的文章，致使名落孙山。陈亮内心不服，对考官颇有微词；有人传话到何澹处，何澹非常恼火。不久，何澹转任刑部侍郎。那个酒客知道陈何之间有此过节，故而越级上告。何澹接到诉状，大喜过望，立即派人将陈亮与狂士抓捕，投入监狱。何澹公报私仇，下令严刑拷打，把陈亮打得体无完肤。最后又将案情上报孝宗皇帝，建议判处死刑。

周孔之道与孔孟之道

——宗周礼乐文明与儒学渊源（上）

□ 韩 星

现在提起“儒学”，人们总是将其同“孔孟之道”联系在一起，但这种理解只能说是宋明以后程朱理学占据对统治地位下形成的观念，而在先秦和汉唐的大部分时期里，人们对“儒学”更普遍的理解是“周孔之道”。同样，提起儒学的渊源，人们都说山东曲阜是儒学的源头，但人们往往忘了儒学的直接源头是西周礼乐文明，而西周礼乐文明的肇始地是岐山周原，策源地就是丰镐二京。所以，儒学的直接源头是在陕西。

西周制度建设、礼乐文明方面贡献的肯认。

安抚殷民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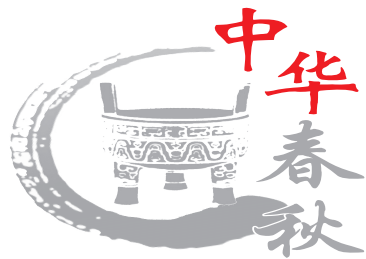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当时又称他为叔旦，因其封地在周，故称其为周公或周公旦。商朝末年，纣王当道，外征东夷，内用奸臣，宠幸后宫，残害忠良，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此时，周人观商朝气数已尽，便励精图治，试图推翻商朝。文王死后，其子武王继承了遗志，任周公为最主要助手，在召公、太公等人辅助下，于牧野誓师，号召大家推翻商纣王的暴政。当时，周武王征求三公的意见，姜太公说：“我听说过，爱屋及乌。如果相反，人不值一爱，那么村落里的篱笆、围墙也不必保留。”意思是不光杀掉殷纣，连敌对的殷人也不能保留，而要统统杀掉。周武王不同意。又找来召公商量。召公说：“有罪的杀，没罪的留下。”武王觉得还是不妥。于是又找来周公。周公说：“让他们各自居住在自己的家里，种自己的田，不要因为旧朝新臣而有所改变，亲近仁爱的人。百姓有了过错，责任在我一个人身上。”周公这种给殷人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深得武王的赞许。武王命令召公释放被囚禁的纣王的叔父箕子和被关押的其他贵族；修整商人故居，并且设立了标志；让阎天培高王子比干的坟墓；命令南宫括散发了鹿台的钱财，打开钜桥的粮仓，赈济饥饿的殷民。这一切措施都表明周人要反殷纣之道而行之，给受殷纣残害的人平反昭雪，大力争取殷人民心。

平定内乱，制礼作乐

周灭商后，武王病重，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周公，周公涕泣不止，

坚辞不受。武王死后，他坚持让年幼的成王继位。面对国家初立，根基未稳，诸侯尚存异心，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复杂形势，年幼的成王根本无法应付。在这危难时刻，周公挺身而出，执政称王，并发挥王的作用。但管叔散布流言：“周公将不利于成王。”灭殷后的第三年，管叔、蔡叔鼓动起武庚禄父一起叛周。起来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刚刚建立3年多的周王面临严峻考验，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王室内部也有人反对周公主持怀疑态度。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但他很镇定，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奭。他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形势而称王，是担心天下叛周。否则我无颜回报太王、王季、文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奉成王命，率师东征。经过3年的艰苦作战，终于讨平了叛乱，征服了东方诸国，收降了大批商朝贵族，同时斩杀了管叔、武庚，放逐了蔡叔，并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50多个国家，从此周的实力延伸到海边，疆域东到大海。

局势基本稳定下来以后，为进一步巩固周朝政权，周公旦将上古至殷商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结合周人的礼乐经验，重建起庞大复杂的周礼体系。“周礼”不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且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那么，究竟“周礼”有几方面的内容呢？据《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礼有所谓五个方面，称为“五礼”。一是“吉礼”，主要内容是祭祀邦国鬼神地祇。又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是天地之神，主祭者是周天子，别人没有资格，只有陪祭。另外是除泰山和四岳等几个高山之外的山



川之神，一般在哪个诸侯国，就由那个诸侯祭祀。上述两方面称为“外祭”，那么“内祭”是什么呢？内祭就是祭祖先神灵。祭祖很重要，许多礼乐活动都与祭祖有关。这部分成为后世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很强大的社会功能。第二是“凶礼”，作用是“哀邦国之忧”，包括死丧、灾荒、疾病、军败等方面。第三是“宾礼”，作用是“礼亲邦国”，即加强邦国之间联系的礼仪，有朝见天子及诸侯之间使节来往等内容。第四是“军礼”，包括出兵打仗，田赋役的分配，军事演习、大的劳役和大的封建活动，都用此礼。第五是“嘉礼”，涉及日常生活较多，包括乡饮酒礼、婚礼、燕礼（贵族接待宾客之礼）、射礼等。由此可知，“礼”确实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周代礼乐文化即是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集中体现，又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奠定了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基础，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公还提出了“敬天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等一系列思想，这些后来都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所以后人把他尊为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周公之礼特别重视“德”的内在精神。《左传》文公十八年还有这样一句话：“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这是说周公制定《周礼》，认为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是否符合礼仪的原则，是判定其道德操守好坏的标准，以道德操守来处理事情，以处理事情的业绩来计算功劳，以功劳大小来决定获取报酬的多寡。所以王国维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

7年后，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正轨时，周公又毅然让出王位，还政成王，并谢绝成王挽留，及时归隐。这种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始终被后代称颂。后来，成王把周公的后代分封到鲁国，赐给高贵的车马、旗帜、美玉、良弓，以显要其身份；授给辅佐天子的礼官、礼籍、礼器，使鲁国有享受与周天子一样规格的礼乐，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周礼尽在鲁”。后人这样评价周公：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被后世尊为“元圣”，乃“儒家”之先驱。

权，也不愿随意草菅人命。

苏轼的侥幸

仔细思考，陈亮能幸免一死，与其说遇到孝宗，不如说遇到“宋朝”，因为“宋朝”，无论是北宋或南宋，都有较好的的人文环境。当然，人性是复杂的，其幽暗性在任何时代总会有所显现，宋代也不例外。这一点，苏轼就有过深切的体验。苏轼被陷“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御史台做了漫长的审讯。指控者从苏轼100多首诗里找罪证，穿凿附会，深文周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与此同时，朝廷内外也有人仗义执言，为苏轼说公道话。不过，最终判决决定于宋神宗。是年岁末，案子终于有了结果。苏轼只是被贬到黄州，降职为团练副使。

“乌台诗案”，无疑是一起“文字狱”。始作俑者是那些指控者，而不是苏轼，毕竟写作诗文是他的权利与自由。苏轼未被一棍子打死，表明宋神宗的宽容度高于那些指控者。试想，如果宋神宗与那些指控者一样，不仅苏轼本人死定了，而且会揪出一大批“同党”，举国上下必将掀起一波波“文字狱”。因为权力具有极强的放大效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的好恶对朝野内外都产生巨大影响。是故，中国古人心中总有“明君情结”，指望出明君安定天下，不希望出暴君或昏君瞎折腾。

宋仁宗的自律和理性

所谓明君，应该既拥有高超的治

国才能，又具备良好的个人品行。综观历史，没有哪个朝代明君辈出，而暴君与昏君倒是层出不穷。有宋一代，最值得称道的并不是出了多少明君，而是没有出一个暴君。究其原因，主要是宋朝开国后就崇尚“文治”，历任皇帝既注重以文化人，也能够“以文化己”，因此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人文修养。

其中最为称道的当属宋仁宗。有史料记载：“仁宗圣性好学，博通古今”。宋仁宗纳谏至诚。有一年，淫雨霏霏，好久不停。台谏认为这是宫中阴盛的缘故，建议裁减妃嫔。奏折送到宫中，宫女正在给仁宗梳头。得知台谏的建议，宫女颇不服气地说：现在两府、两制大臣家中养了不少歌伎，官职稍如意的人家，往往增置不已。官家妃嫔侍女本来就少，凭什么说阴盛要裁减？只许他们享乐快活，不让官家身边有几个贴心者？仁宗沉默许久，对宫女说：台谏之言，岂敢不行？宫女说：如若施行，首先把我们裁了。果然，仁宗不得不忍痛割爱，把贴心的梳头宫女和一些妃嫔遣送出国。

宋朝何以出现如许有人文修养的皇帝？这个问题，还是要追溯到宋太祖身上。宋太祖虽行伍出身，但他黄袍加身以后，制定了“重文抑武”国策，礼遇文人士大夫。他给后世子孙立下一条遗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纵观宋朝诸皇帝，无不将太祖的这项遗训视为家法祖训，并且认真贯彻执行。宋朝皇帝懂得敬畏生命，不以暴虐立威，随意屠杀臣民。这一点，也是后世士大夫向往与赞美宋朝的重要原因。